

小时候，我们兄弟三个都怕父亲，特别是在调皮捣蛋的时候，只要母亲一声“你爸回来了”，或远远看见父亲的影子，听到父亲进门的脚步声或咳嗽声，我们都会马上停止吵闹，乖乖的坐在那儿，或去做自己应做的事。否则，轻者，会被父亲恶狠狠地瞪上几眼，骂上一通，重者，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。所以，背地里我称父亲为“阎”父。就是像阎王爷一样地狠。

称父亲为“阎”父，我是最有体会的。

记得有年夏天。我趁大人们没注意，就喊邻居

二狗偷偷地去堰塘洗澡，他见我脱光衣服往堰塘里跳，也跟着仿效。谁知，他这一跳，被呛水了。头顶上直冒水泡，两只手伸出水面乱抓，人在原地旋圈圈，这下可吓坏了我。幸亏村里张大伯路过，把他救了起来。可这事过了好些天，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了，便把我叫到跟前询问。本来就怕事的我，面对父亲凶狠的眼神，吱吱唔唔地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父亲突然大吼一声“给我跪下”，顺手揪起我的耳朵，一边用扫把恶狠狠地抽打我的屁股，一边念叨着“看你以后还长不长记心，再喊不喊湾子里的小娃子们

我的“阎”父

■ 卢林洲



偷偷地去玩水，这次要不是人家张大伯路过相救，一定会出人命关天的大事呀！”好在一旁的母亲听着我“再也不敢了”的哇哇大叫，多次出面说情才算罢休。事后，母亲对我说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敢做敢当。刚开始，父亲问话，你照直说不就得了。”一连几天，母亲用父亲买回的膏药给我擦屁股上的伤痕，可我强忍着疼痛，心里在恨父亲下手太狠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他的亲儿子。

记得还有一次，我去田边剜猪菜，回家时在路边捡到一把剜菜用的铲子，父亲见状，逼着问我是不是偷的，我一再否认，父亲不信，却说：“哪有那么巧的事，都让你碰到了，要不，你再去捡一把给我看看。”父亲见我不吱声也不动，反而大声地怒斥道：“从小偷针，长大偷金。”硬要我从哪儿

拿的，再原文不动的放回去，没办法，我只得将那把捡来的铲子又原文不动的放回到了那个路边，父亲才罢休。

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周末，开车送父亲回老家，路过一小巷，快到尽头，突遇对面拐进一辆红色的小轿车，我在鸣笛后，对方没反应。父亲劝我往后退。事后，我埋怨父亲。父亲却说，你看对方明显是个新手，你不让，出了事情怎么办？随后，父亲还向我讲述了清朝康熙年间，大学士张英书信劝家人退让三尺巷，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，让我无言以对。

人们常说，严师出高徒，严父出孝子。现回想起自己能从一个山旮沓里走进集镇再到都市生活，不正是“阎”父从小严加管教，教我如何做人所换来的幸福生活吗？

董必武的“不计较”

■ 刘学正

闲暇时，我喜欢去街角的一家旧书店淘书，每一次与心仪图书的“邂逅”，都是一份不期而遇的美好。这天，我又走进店里，可惜翻了大半个下午也没找到几本钟意的。淘书多年，店主也算得上是老友，他见我略显遗憾，便随手递来一本书说：“这个挺不错，是诗人顾城的父亲写的，他年轻时候的恋爱故事。”我拿在手里一看，《年轻时我热恋》，果真是顾工的作品。

书中讲述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，世事纷争应接不暇，爱情故事极具浪漫色彩。然而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却是作者提到的一则轶事：

1949年，20岁的顾工被派到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演出委员会工作。一次，梅兰芳在长安大剧院演出，顾工负责“看座位”，演出委员会的领导特别叮嘱，楼上前排的包厢座位，只有中央委员来了才能坐，其他人一概不行，切记！

就这样，恪尽职守的顾工接连婉拒了自己最崇拜的电影明星白杨、文代会主席团委员黄镇。这时，他看见一位颌下飘着白须的老人犹犹豫豫地在前排坐了下来。顾工当即走过去，附在他耳边轻声提醒：“同志，这是中央委员坐的。”老人听了，仿佛做了一件很失礼的事，连连点头致歉，然后走到楼座的最后一排，扶着椅背，凝立不动。

即将开幕的预备铃声拉响后，中央领导人依次入场并坐在了前排，毛泽东在向热烈鼓掌的人们挥手致意时，看到了伫立在最后一排的那位老人。“董老，您过来，过来嘛。”毛泽东向他大声招呼，老人踏着一级级台阶欣然走来，毛泽东扶他坐下，愉快地与之谈笑。

顾工这才知道那位被他赶走的老人，竟然就是

几个月后的政务院副总理，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！拥有如此显赫的身份，在面对“底下人”的劝退时，董必武却毫不介意，难怪顾工在事后常常感到愧疚，也时时诧异：当时他为什么不加以申辩呢？

其实，顾工当时如果不把目光只看向“身份”，而是去了解董必武的为人处世原则，或许就不会有这种疑惑了。据载，红军长征时，年纪大、身体也不好的董必武严格要求自己，背负和年轻人一样重的东西行军，同时照顾妇女干部和伤病员，夜间还要起来查铺、查哨。一次，董必武在替抬担架的同志换肩时，由于太过劳累，脚下打滑，一下子摔进泥坑，浑身沾满了泥巴，被队员送上一个“泥人董”的绰号。而解放战争期间，华北农村的老乡经常会在村头、街巷遇到一位操着湖北口音的老同志，见他衣着朴素、没有官架子，老乡就问：“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”董必武则笑呵呵地答：“我是当勤务员的，人民的勤务员嘛！”

董必武曾说：“一个自觉的革命家和一个普通人不同之处很多，但重要的一个区别，就是他们对于‘我’的态度不同，是唯我呢？还是忘我？是以我的利益为出发点，还是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。”在朱德60岁生日时，董必武作诗《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》，其中一句写道：“要作主人不作客，甘为民仆耻为官。”而这也是董必武始终奉行的行为准则。

合上书，我为董必武的“不计较”而热泪盈眶。这种不拿身份压人，不为难“底下人”的为官者修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重，也为后世树立起了为官做人的典范！